

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 学术演进和智识革新（1978～2018）

孙 超

【内容提要】 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同步，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在研究传统重建的基础上，不断适应崛起中国对学科专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求导向到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模仿和借鉴西方理论到建设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从服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导向到相对独立的研究欧亚地区各行为体“在地知识”、联动内政外交分析其内外战略，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到丰富细化的问题领域和规范科学的方法论意识，中国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当前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但是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必然会随着中国的“智识革新”而不断进步。

【关键词】 俄苏研究 国别与地区研究 学术史 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 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导 言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全面变化，锐意进取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在俄苏研究方面，新的问题领域、理论视域以及研究方法不断涌现，一起推动了四十年来中国俄苏研究的“智识革新”。对俄苏研究尤其是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回顾，不仅有助于反思和推动当前的学科建设，加速俄苏研究领域的学科化、国际化和细分领域的深度发展，而且有助于利用四十年来所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当前中国与后苏联空间各个国家的交往提供助力。

俄苏研究是20世纪从业人员最多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国学术界对欧亚地区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和研究。在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下，俄苏研究的细分领域——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有力推动，生成了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一种独特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既不同于研究俄苏古典语言文化、思想、文学和历史的人文传统，亦不同于研究美欧外交与国际关系史的西方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传统^①。其独特性在于，在有效学习和吸取前者成果的同时，又在后者提供的范式和理论基础之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正如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绍雷教授所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俄苏研究以十年作为大跨度的阶段，从起步、深化再到提升和国际化，无不凝结着几代俄苏研究学人的心血^②。如今正值第三个阶段：自2008年以来，俄苏研究学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增进专业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升研究的质量。

在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时，可以发现，在俄苏研究领域中以年代为特征的学术特色较为明显。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在70年代末进行知识更新和观念重建不同，俄苏研究在70年代末呈现出来的是“新生”景象。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Gilbert Rozman）观察到的，中国战略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已发生“静悄悄的革命”，将长期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学习的经验教训转化成为俄苏外交学领域研究深入的知识背景，站在全球和地区的立场上而不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研究对象，尝试建立新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③。80年代，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刘克明先生在总结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时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俄苏研究领域逐渐摆脱了“简单化、片面性”缺点，经过几年努力形成了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④。

1991年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召开第三届年会。面对苏东剧变带来的国际格局的急速变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郑必坚在会上表示，俄苏研究要有“英雄”志气，需要将它当成大事业来干^⑤。90年代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大发展时代，学者

^① 具体参见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畴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一项观察》，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Chinese 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1980s”，in Gilbert Rozman (eds.)，*Strategic Thought in Northeast Asia*，Palgrave Macmillan，2010，pp. 47 - 48.

^④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载《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

^⑤ 《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召开第三届年会》，载《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4期。

开始愈来愈注重学科领域中的专题研究，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渗透到地区问题研究领域之中，潺潺溪流有形成江河之势。苏联解体后，后苏联空间出现 15 个国家，原有的单一政治地域变成了“地区结构”，成为国际关系学者竞相分析的对象。西方也从“苏联学”反思中挣脱出来，运用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对各国的内外情况进行分析。中国学术界在对外开放的学术大潮中跟上了国际学术界的节奏，开始有意识构建理论，国内学术界的交流逐渐活跃起来，从国际关系角度切入俄苏问题的学者增多，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俄苏研究的重要方向。有关俄苏地区问题研究的学术研究基地、研究刊物和研究队伍有条不紊地建设起来。在这个大背景下，俄罗斯东欧中亚方向的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俄苏领域研究形成飞速发展的局面。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推动中国精英时刻关注走向另一条道路的俄罗斯，通过不断译介西方著作重构“俄罗斯形象”，知识精英围绕着俄罗斯发展展开激烈的学术与话语交锋。而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大国关系视角研究后苏联地区，而且在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具备了一种超出西方区域研究视野之外的更为宽广的视野。随着全球问题的不断涌现，次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力量不断增强，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而这些内容也无疑拓展至俄苏领域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研究领域。“颜色革命”、地区冲突、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能源安全以及国家建设等相继成为 21 世纪以来俄苏研究中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的新话题，吸引学术界的大量关注。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专著的大量引进，欧亚地区研究学界的理论研究意识和自我认同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俄罗斯经验来验证和发展西方理论，并逐渐融入中国视角和思想。正是在这个时代，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地区问题研究既服务于政府，也成为专门学问，满足公共消费需求^①。另一方面，“俄罗斯学”和“当代中亚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俄罗斯东欧中亚各国战略和外交研究的变革。尽管学界对“俄罗斯学”和“当代中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存在很大争议，但这恰恰表明中国学者在新时期具备主体意识，从中国特定视角展开研究，形成中国的俄罗斯观、中亚观以及新欧洲观的尝试^②。

^①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11 期。

^② 赵传君：《关于创建中国俄罗斯学的探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 年第 6 期。

除了学术环境，国际事件的出现以及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进化^①。2000年之后，俄罗斯周边国家发生过政体变革，“颜色革命”的频繁出现与俄罗斯政治权威主义的巩固形成鲜明对比。2008年，俄罗斯又与周边邻国爆发地区冲突，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及随后俄合并克里米亚对欧亚地区秩序和国际格局都产生重大影响，国际上“新冷战”的言论甚嚣尘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遭遇严重挑战。在这些问题上，西方学术文献大多对俄罗斯的立场和行为持抨击和否定态度，西方学术文献中对俄罗斯带有鲜明偏见的研究更警醒国内学术界反思“社会科学美国化”的倾向，在推动关键概念和议题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有主体意识的学术探索。当前，发展中国的“俄罗斯学”“中亚学”，同西方展开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消解美国的话语霸权，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②。另外，随着普京于2012年的再次连任，中俄两国不仅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较为相似的立场和态度，而且在国内政治发展上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体制亲近”现象。两国的安全、政治和战略利益共识随着当前美国加紧护持霸权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断增强。当前，对俄罗斯外交转向以及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讨论成为中国战略学界的重要话题。中国学者的主体性逐步增强，挖掘新的问题领域、构建和发展研究俄罗斯欧亚对外关系的中层理论、丰富和发展俄罗斯外交领域的案例内容成为当前中国学者持续努力进行的工作。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数代中国学人的努力下，中国的俄苏研究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本文将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俄苏研究中的细分领域——俄罗斯外交部分在这四十年发展进行比较分析，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梳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建俄苏研究方式和传统认知谱系，第二部分从国际关系学引进和发展的角度探讨90年代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演进，第三部分梳理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俄罗斯外交领域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法，第四部分探讨2008年以来中国的俄罗斯外交领域研究发展历程，最后一部分进行简短总结。

^① Robert Jervis,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 Vol. 52, No. 4, p. 973.

^② 陈小鼎、王亚琪：《国际关系的话语权之争——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

一 俄苏外交研究传统的重建与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国家的巨变和民族的复兴。俄苏研究的“新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围绕着未来的发展道路，国内学术界对苏联经济模式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反思，讨论未来进行经济改革的可行性^①。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后，中国的对外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经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中国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中苏关系也在此时发生变化，两国之间长期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中苏之间的接触也为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预留空间。正是经济、思想和外交领域的变化促使俄苏研究走出了“敏感区域”，从“内部体系”逐渐走向学术研究，政府对俄苏问题研究的迫切需求也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③。

在学者内在情怀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俄苏领域的研究逐步发生转变，显示出五种趋势：从意识形态对抗需要的研究逐渐生发出独立的问题领域和意识；从历史探讨开始有意识对当前的俄苏问题进行现实探究；从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分析发展为多学科领域综合分析；方法论上从描述性分析为主转向以案例研究为主，从探讨国家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研究等狭窄议题拓展为多种主题，形成了独特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这五种趋势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阶梯状关系，也正是这种阶梯状的发展推动了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道路。

（一）从“反苏（沙俄）霸权”到“观察苏联对外政策”（1978~1982）

改革开放初期，俄苏研究问题领域逐渐发生转变，首先一个大趋势即从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出发论证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逐渐生发出关注国际问题、拥有独特问题领域的俄苏地区研究层次的学术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基于几

^① Marshall I. Goldman, “China Rethinks the Soviet Mode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0, Vol. 5, No. 2, pp. 50 - 51.

^② 李宝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1期；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1985, Vol. 37, p. 438.

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改革开放后不断创新和锐意进取的思想氛围使得学术力量大为振兴,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更为切实的问题领域。1978年李显荣在《历史研究》中以评述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为基础,批判书中美化俄罗斯对外扩张的行为^①;其标题《“马克思主义”还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极具历史象征意义,不仅预示着学术界将苏联东欧问题纳入国家层面,也暗示着思维的枷锁在逐渐打破。很快,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于1979年翻译出版,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历史研究》刊载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部分译文,并进行相关评述,借以窥探俄罗斯文明对外交往的动力与行为逻辑——即争夺霸权,实现世界帝国的迷梦^②。《历史研究》的风格延续了一条以研究俄罗斯文明历史上的对外行为来探究苏联对外政策的分析路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俄关系史探讨俄罗斯对外行为的根源,对苏联(沙俄)对外行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讨论继而成为俄苏研究传统的底色^③。学者们根据其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历史上对外行为进行类比,揭露其“霸权主义”本性。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1年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和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对苏东地区的国际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科研攻关,上海也成立了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而研究这一领域的两本核心刊物——《苏联东欧问题》《今日苏联东欧》也于此时创刊。观察苏东外交风云,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已然成为这一研究团队的重要任务。可以看到一些杰出学者已经在培养和构建这一领域的兴趣和知识。方连庆研究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强调如今苏联的侵略行径与列宁对兼并的定义毫无区别,是“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

① 尽管李显荣并没有将沙俄的侵略行径与当前苏联的对外行为等同起来,但其所使用的方法逐渐演化出一种“向历史学习”的历史类比的传统方法,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苏俄国际问题的研究传统。参见李显荣:《马克思主义,还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评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参见〔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东至:《揭露英国政府纵容老沙皇扩张主义的光辉文献——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简介》,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朱寰:《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五章读后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③ 例如萨本仁:《试论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中的社会沙文主义》,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郑绍钦:《潜入我国南疆的第一个沙俄间谍》,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杨增书:《沙皇俄国对伊朗的侵略和渗透》,载《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刘祖熙:《叶卡特琳娜二世和沙皇俄国》,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曾宪权、海风:《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周友光:《略论英帝与沙俄称霸的几个特点》,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张汉清:《恩格斯晚年反对沙俄霸权主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政策的表现”^①。刘次涵研究近代中国改良主义者关于沙俄及其侵华活动的思想，总结出应对“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应该在各个方面加以防范，呼吁放弃类似“名誉孤立之外交政策”等主观空想，应壮大自身反对霸权^②。刘金质梳理了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向国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研究苏联的情况，其结论很有意思：一方面总结侵略扩张是苏联对外行为的本质，另一方面要通过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实力对比以及苏联的内部情况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变数^③。这几年的发展趋势可以表明，俄苏研究团队已经组建，“观察苏联对外政策”已全面超过了“反苏（沙俄）霸权”政治任务。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与新问题意识的形成（1982~1987）

1982年对俄苏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除了刘金质先生全面介绍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情况以外，日本学者伊东孝子的《日本的斯拉夫和东欧研究》被译介过来。日本学者研究斯拉夫和东欧问题已经有丰硕成果，其提出的地区研究层面的问题正当其时：（1）地区研究是传统学科还是新兴研究；（2）研究俄罗斯是研究样板还是现实；（3）地区问题能否成为“纯科学”；（4）如何克服文化与语言障碍；（5）缺乏国际交流，国际问题研究如何继续；（6）如何培养斯拉夫研究的人才梯队^④。伊东孝子提到的问题也正是俄苏地区问题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很快，其他刊物相继刊载书评^⑤，尽管都是论著提要，但却反映出中国学者追求真理的渴望。在俄苏学术界，《苏联东欧问题》《今日苏联东欧》《苏联问题研究资料》等期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国外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献、主要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这为地区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尽管如此，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是俄苏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当时对原苏东国家的关注主要是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重要的参照系，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是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支持^⑥。

① 方连庆：《列宁领导时期苏维埃俄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2期。

② 刘次涵：《评述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对沙俄及其侵华活动的研究》，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③ 刘金质：《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载《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3期。

④ [日]伊东孝子：《日本的斯拉夫与东欧问题研究》，载《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6期。

⑤ [罗马尼亚]P. 苏扬：《作为一门科学的国际关系》，载《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波兰]尤·库库尔卡：《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5期；[苏]Φ. M. 布尔拉茨基：《国际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政治研究》1984年第2期。

⑥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一项观察》。

虽然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缓慢地进入地区研究知识界，但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刘金质先生对西方国家的地区问题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运用较为规范的方法描述了苏联学在西方的进展，并且有意识地运用理论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探究^①。甄荣、宋锦海探讨苏联的中东外交和中东政策，对苏联的未来中东战略进行分析^②。顾志红、王宝勤等学者研究苏联的第三世界扩张战略，从美苏争霸入手探讨苏联对外行为的方式与策略^③。杨家荣总结苏联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苏联对外政策演进进行分析，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总结最为有力：（1）以实力为后盾，采取对外进攻性态势；（2）以“缓和”为幌子，麻痹西方国家；（3）以“共同规律”和“有限主权”为名，加紧对东欧控制；（4）以“军援”和“经援”为诱饵，逐渐渗透亚非独立国家^④。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地区问题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信息披露和资料整理占学术研究的较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也是以介绍为主，分析为辅。多数研究依然以分析性叙述为主，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尚未进入这一领域。但从发展态势来看，地区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人才培养梯队逐渐形成^⑤。这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理论构建主体性增强与地区问题研究的进化（1987~1991）

1987年对国际关系研究和俄苏地区问题研究而言意义非凡。一方面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理论层面提出“新思维”，其对时代的判断、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新看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由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提议，在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的支持下，第一届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时代

^① 刘金质：《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的研究》，载《世界政治资料》1983年第5期；刘金质：《缓和与七十年代的苏美关系》，载《政治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甄荣：《一九八四年以来的苏联中东外交及其发展趋势》，载《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4期；宋锦海：《勃列日涅夫以后苏联的中东政策》，载《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2期。

^③ 顾志红：《苏联与美国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较量》，载《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2期；王连志：《苏联在阿富汗的三管齐下战略》，载《国际问题资料》1985年第20期；王保勤、阎玉梅、顾关福：《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载《世界知识》1984年第17期。

^④ 杨家荣：《试析苏联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载《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1期。

^⑤ 有关这一方面的具体信息参见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畴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

观和战争观、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发展、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道路^①。

随着国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大规模译介和研究的深入，俄苏地区问题研究领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兴趣逐渐高涨。陈乐民先生重新分析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将国际关系研究总结为两派——没有理论的“务实派”和对国际关系概念化的“务虚派”，他呼吁学者先有问题意识，再去研究问题，而不是就材料来“空想”题目^②。谢益显重新梳理了苏联霸权主义的观念，将苏联对外扩张理由概括为“国家安全”、革命输出和国际主义，并深入探讨其理论根源和思想根源^③。赵华胜探讨了苏联国际关系的发展脉络，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④。邢书纲重新探讨了“当代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指出其对外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承认其维护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合理性层面，但又反对其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本质^⑤。对现实层面的苏联对外关系，学者们也给以充分的关注。杨文达探讨了苏联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初步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讨论；王维周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东南亚政策，研究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战略，并对此进行评述；顾关福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新思维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讨论^⑥。在国际关系学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有关苏联地区问题研究的分析文章也大量涌现^⑦。学者们普遍有了学术自觉意识，理论构建的主体性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历史对比，而是对苏联现实对外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一般性的知识。苏联对外关系的现实逐渐成为国际问题讨论的话题。

随着1989年苏联对外战略的调整，有关苏联对外战略的研究日益增多，质量和数量都得到很大的提升。根据统计，在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中搜索有关“苏联外交”的内容，1988年为521篇，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为594

① 田志立：《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

② 陈乐民：《〈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③ 谢益显：《苏联霸权主义的历史、思想和理论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年第1期。

④ 赵华胜：《当代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简介》，载《国际展望》1987年第9、10期。

⑤ 邢书纲：《关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探讨》，载《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11期。

⑥ 杨文达：《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与西方经济关系浅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8期；王维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苏联东南亚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11期；顾关福：《新思维与苏联的对外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⑦ 宋锦海：《试评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的中东政策》，载《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3期；林修坡：《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载《政治研究》1988年第3期；刘靖华：《八十年代苏联中东政策的发展演变》，载《西亚非洲》1988年第2期。

篇,1991年达到657篇。这一方面与戈尔巴乔夫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实施“外交新思维”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对外关系的兴趣日益浓厚,研究也更加规范。地区问题研究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飞速的“进化”。

二 俄苏问题研究的转型与细分领域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不仅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适应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终结之大背景的时期,也是欧亚地区问题研究不断加强的时期^①。随着苏联解体,欧亚地区诞生了15个新国家。对于这一历史剧变,学术界显然缺乏准备,如何从研究苏联外交过渡到研究欧亚地区15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如何重新认识俄罗斯的对外关系,成为对学术界构成挑战的现实话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学术界也展开大辩论,讨论国家的未来走向^②。而对中国学者而言,重新梳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挑战更为巨大。此时,中国也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从前以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参照系的路线突然消失给思想界带来极大震动,也导致90年代中国的俄苏研究进入一轮调整期。

中国在90年代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可以基本上概括为“俄罗斯问题研究”。学术界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外交走向的关切比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地区甚至中亚地区的关切更为明显,对俄罗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研判明显要强于对俄罗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尽管这促成了俄罗斯战略、政治与外交等细分领域的形成,但也造成中观和微观研究不足,研究力量和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因此,90年代俄罗斯问题领域的学术进展并不是如80年代那般高歌猛进、层层递进的逻辑脉络,而是呈现出一种危机与机遇并存、反思与进取同在、理性审慎与乐观坚定共有的状态。

从研究者所处的研究氛围和处境来看,90年代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的确是处于一种调整与机遇并存的局面。这一点可以从苏联解体之后学界依然热衷讨论苏联解体而对新的研究对象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分析数量差异可以看得出来^③。根

① 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② 冯绍雷:《俄罗斯外交大辩论及其背景与后果》,载《今日前苏联东欧》1992年第3期。

③ 根据对知网1992年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当年研究苏联问题的文章为8412篇,俄罗斯的为2186篇。如果两者再加上关键词“外交”,则研究有关苏联外交方面的有637篇,研究俄罗斯外交的有205篇。

据秦亚青对 1978 ~ 2007 年国际关系研究的五本中文综合类期刊的统计分析, 美国主流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 90 年代发表在中文综合类期刊的论文中,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文章的比重占 69%^①。国际关系学界和学术刊物重视引进和应用国外理论研究成果, 尤其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面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加速变革, 俄苏研究领域一方面需要应对苏联解体之后新的学术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还需要摆脱旧认知框架, 研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俄苏问题研究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地区问题”研究的一部分, 这种学术地位的滑落无疑冲击着后苏联空间学术共同体的荣誉感。

这种荣誉感的变化从 1992 ~ 1994 年学术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数量中可以得出简单结论。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 学术界将大多数研究放在如何理解和阐释“苏联解体”这一重大课题上。俞邃讨论“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问题”, 认为其不仅造成了两极格局的终结, 形成“东西力量失衡”的局面, 也促使“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加深, 引起地区集团的结构变异^②。罗肇鸿讨论了“苏联解体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 认为海湾战争造成美国财力难以为继, 多极化发展是趋势, 而这种多极化会导致发达国家之间矛盾日益突出, 中国必须睦邻自重求发展^③。郑彪讨论了苏联解体对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 认为俄罗斯不仅会加紧向东发展, 而且对朝鲜半岛政治形势和东北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④。叶自成探讨了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的对外政策, 认为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积极政策, 独联体会存在, 但独联体各国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抗, 这将使独联体的成员和范围受到影响^⑤。李秀敏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从“扩张”到“收缩”的对外政策, 是因为历史“惯性”和苏联主观上继续保持其军事政治方面的扩张性, 根源在于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导致的结果^⑥。赵凤彬讨论了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格局, 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 西方经济大国对抗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世界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中东及其他周边

①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② 俞邃:《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1期。

③ 罗肇鸿:《苏联解体及其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0期。

④ 郑彪:《苏联解体对东北亚的影响》,载《东北亚论坛》1992年第2期。

⑤ 叶自成:《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独联体政策与独联体的前途》,载《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6期。

⑥ 李秀敏:《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由扩张到收缩的对外政策》,载《外国问题研究》1993年第2期。

地区^①。尽管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俄罗斯外交对中俄关系和世界发展局势的影响^②，从1993年起学界才开展有计划地翻译和撰写有关俄罗斯外交方面的著述^③。1994年进入了大规模研究和讨论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新时代”，有关“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学术论文以每年平均8.67%的增长速度，从1994年的398篇增长到2000年608篇^④。国际关系理论界出于对国际秩序的转换和世界体系的发展重视对苏联与俄罗斯的研究，俄苏问题专家也需要继续深度学习和引进“以美国主流理论为主”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赖的加强也促使学者需要掌握更多其他地区和国别研究领域，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研究领域^⑤。欧亚地区问题研究门槛的提升不仅对研究者形成了挑战，也刺激了俄苏研究领域水平的提升。尽管挑战虽在，但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向后苏联空间国际问题研究转型的速度并没有下降。研究后苏联空间国际问题的“新时代”到来了。

除了上述“挑战与机遇”并存，还可以看到自1994年开始地区问题研究展现出一股进取的力量。这可以从学者关注的新问题和研究方法看出来，有关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外交战略、地区外交政策、外交思想、外交内政的联动关系、国家与地区国际体系的关系等得到全方位覆盖。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东方外交”“平衡外交”等外交战略得到全面系统的考察。在90年代后半期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以看到学术共同体在对俄研究方面迅速寻找到问题领域与共识，针对俄罗斯的对外发展进行了充分有力的探讨。

① 赵凤彬：《论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格局》，载《东北亚论坛》1993年第1期。

② 1992年关注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文章并不多，但也有诸如陆南泉、冯绍雷、赵龙庚、董拜南、陈明山、李义虎、叶自成学者给予了关注。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还需要做区分，一些学者关注点仍是“后苏联空间”——独联体地区和各国与独联体关系。参见赵龙庚：《独立后的中亚：挑战和机遇》，载《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3期；陆南泉：《俄罗斯对外经贸体制改革趋向》，载《经济动态》1992年第12期；董拜南：《独联体的建立及其内部矛盾》，载《苏联研究》1992年第1期；冯绍雷：《俄罗斯外交大辩论及其背景与后果》，载《今日前苏联东欧》1992年第3期；叶自成：《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独联体政策与独联体的前途》，载《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6期；陈明山：《独联体国家外交的基本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2期；李义虎：《从苏联到独联体——大帝国解体周期中的巨人衰竭症》，载《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1993年起，学术界有计划翻译有关俄罗斯和其他欧亚地区各国对外关系的学术作品。参见〔哈〕托卡耶夫：《哈萨克斯坦的欧亚国家地位及多方位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第6期；〔俄〕布拉格沃林：《论俄罗斯外交和军事政策》，载《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3期；〔俄〕季塔连科：《俄罗斯外交政策东亚导向》，载《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期；〔俄〕阿·弗·鲁金：《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和安全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第11期；〔俄〕克洛索夫：《英俄关系：不确定性减少了吗》，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3年第17期；〔俄〕沃龙佐夫：《朝鲜的统一与俄罗斯的利益》，载《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3期。

④ 以知网发表的有关俄罗斯对外关系文章进行统计：1994年为398篇，1995年370篇，1996年441篇，1997年414篇，1998年453篇，1999年501篇，2000年为608篇，年平均增速为8.67%。

⑤ 王缉思：《对美国研究的几点浅见》，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

表 1 俄罗斯国际问题研究中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期刊统计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研究俄罗斯相关学科						
外交与国际关系	370	441	414	453	501	608
社会科学部分	1 034	1 211	1 061	1 110	1 999	1 719
占比 (%)	35.8	36.4	39.0	40.8	25.4	35.3

资料来源：根据知网中社会科学 I 辑检索俄罗斯关键词得出文章总数，表格自制得出。

对欧亚地区各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探讨，成为 90 年代中后期细分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一部分（参见表 1）。随着 90 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外交研究的兴起，可以看到学界对俄罗斯的基本定位是处于复苏中“大国”。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和亚太外交政策成为学界关心的两个话题。尽管 90 年代中后期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波动不定，但学者对此热情不减。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更是引起较大关注。中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分量的一批学术著作也在此刻酝酿问世，引起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很好反响^①。尽管在 90 年代研究后苏联空间地区“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学者依然保持强劲的进取心，并未出现类似美国在“苏联学”衰落后难以转型，遭遇尾大不掉的局面^②。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刺激了中国整体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发展，形成了后苏联空间领域理性审慎与乐观坚定的学术气氛。

三 新问题、新方法与新理论：欧亚地区国际关系学研究规范化

2000 年以来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进入新起点：一方面，普京当选为俄罗斯的新任总统，俄罗斯内外战略进入新的调整期；另一方面，“9·11”事件的爆发促使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向，恐怖主义和所谓“失败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国家内部威胁而非大国关系成为美国所关注威胁的焦点^③。因此，俄罗斯外交转型和美俄关系的演变成为地区问题专家研究的重点。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① 例如研究俄罗斯对外关系两部力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李静杰、郑羽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于滨：《从 X 到 Y：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载《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1 期；于斌：《西方苏联学的内涵和外延》，载《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6 期。

^③ Sebastian Mallaby, “Rice’s Blind Spo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3, 2006, p. 15.

所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组织专家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交流讨论,形成了丰硕的成果^①。总体而言,专家们一致认为俄美关系并不存在零和博弈,利用欧美矛盾建立良好的俄欧关系,推动中俄关系的发展,成为普京外交战略的主线。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仅对大国关系进行分析性叙事,从理论角度挖掘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思考俄罗斯对外战略形成的动力与机制成为学界努力的新方向。冯玉军接连发表两篇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因素^②。关贵海、钮菊生、陈训明等学者着重于从俄罗斯意识形态、外交思想及地缘政治思想方面探讨俄罗斯对外行为的动力源^③。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冷战史研究逐渐兴起。对冷战时期俄罗斯对外行为的探讨成为冷战研究的重要主题,这也反过来促进了国际问题研究界与冷战史学界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史学与理论互相成长的“共生关系”^④。

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展开,中亚地缘政治变局成为2002年的主题词^⑤。2002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新起点。自“上海五国机制”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一体化成为学界关注新焦点。潘光、许涛、赵华胜等专家开始了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长期跟踪研究,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⑥。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两者作为研究对象的高度重叠为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打开了新视界,也大大加强了学者对中亚和欧亚地区一体化深度的知识积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深入,邢广程、冯绍雷等专家组织团队开始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组织构建

① 参见2011年发表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和《现代国际关系》两篇重要的会议综述:《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3期;《俄美能走多远》,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2期。

② 冯玉军:《俄罗斯对外政策智囊库与外交决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9期;冯玉军:《俄罗斯利益集团与外交决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

③ 关贵海:《论俄罗斯转型期的意识形态》,载《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2期;钮菊生:《俄罗斯外交思想探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陈训明:《萨维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④ 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朱晓姝:《对冷战起源的一点认识——兼论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刘金质:《关于冷战的几点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

⑤ 参见组稿《大国战略与中亚地缘变局》,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2期;《欧亚地区安全合作与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

⑥ 潘光:《新形势下的上海合作组织:挑战、机遇和发展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潘光:《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潘光:《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与新形势下的上海合作组织》,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增刊;许涛:《论新形势下的上海合作组织》,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6期;赵华胜:《中亚形势变化与“上海合作组织”》,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

进行系统研究，有计划出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和《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发展报告》，延续至今^①。

对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逐渐开启的系统研究激发了学者对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第三方因素与新的问题领域的兴趣。随着能源政治和反恐斗争的兴起，俄罗斯在这些议题上的表现引起广泛的关注。2002年10月底，俄罗斯原油产量达到每天797万桶，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产油大国。俄罗斯在世界能源政治格局中占据了异常关键的地位，强化能源外交，同欧佩克抢占国际市场份额^②。“9·11”事件之后，在“反恐”问题上中美俄三国存在着广泛的共识，有着共同的利益取向，但也展开了围绕着后苏联空间国家之间权力争斗的“大博弈”^③。正是这种大博弈导致欧亚地区兴起较多的问题领域：恐怖主义兴起以及随后的阿富汗战争扰动高加索地区、中亚费尔干纳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自2003年起欧亚地区不断涌现“颜色革命”；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安排；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加速了俄美在东欧国家和地区的争夺。围绕这一系列新问题领域，学者们努力精进，形成多种方法和研究方案，极大地扩展了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渐形成了中国欧亚地区外交研究机构的几大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密切关注欧亚地区时局，在咨政研究和学术理论创造之间构建平衡，具备强烈的创新精神。以冯绍雷教授为首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团队力图打通国际政治与制度变迁的关联性，通过转型研究、权威政权建设来研究俄罗斯内外战略的延续性^④。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于2002年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后获得三个专业硕士授予权，在杨恕教授等人的努力下，国内中亚地区问题研究不断精进，其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和政治社会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中国中亚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在新疆，受恐怖主义和“大博弈”带来的周边环境的严峻影响，以潘志平教授为代表的中亚研究所开启了地区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研究，对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在地问题及其内外联动进行深度的探讨。在黑龙江，中俄交流与合作成为其研究重

① 邢广程、孙壮志主编：《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从2009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编的《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每年出版一次，呈现最新的上合组织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亦在2009年向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年度咨询报告，后于2012年正式公开出版。

② 参见组稿《国际石油的战略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

③ 邢广程：《由中俄美关系变化引发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4期。

④ 参见冯绍雷组织专家撰写的“转型研究丛书”：《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点。自2001年起,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研究所合作,轮流承办召开中俄区域合作与发展国际论坛。除此之外,在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出现了研究新问题的领军人物。

伴随着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新问题领域的形成,方法的转型成为迫切之需。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与政治》两家刊物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国际关系学界资深专家汇聚一堂,讨论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①。欧亚学界对新方法的需求同样迫切。一些学者迫切希望通过新方法的推进和新理论的挖掘来减少新老“学术更替”所形成的学术真空。正如一位学者所忧虑的,“以往之大师名家,多半已年老凋谢,学术衰弊之状渐次显现”^②。但也有学者高兴地看到,中国学者能经常与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及各国学者和专家交流,一些学者多次受邀参加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俄罗斯和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新局面^③。这两种情绪事实上普遍存在于欧亚地区研究中,一方面是体现对研究议程的跟踪与科学方法习得的紧迫感,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学者立足国际层次重新思考研究议题本身。这种状态开启两种研究范式:一是学习借鉴俄罗斯和西方的学问,反思中国的学术理论建设,进而推动中国欧亚地区国际研究的发展;二是重新回归中国的“超地域”战略思维传统,以强烈的中国关怀去思考和规划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这种趋向从21世纪头几年开始逐渐成型,后发展成为两股学术浪潮。

第一股学术浪潮着眼于海外的国际关系研究,透过俄罗斯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棱镜来反观自身,推动自身理论建设和方法论演进和发展。刘军和强晓云通过研究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和发展趋向,认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也呈现出类似中国学术界的多元化、西方化和孤立化的倾向^④。冯玉军译介了俄罗斯著名学者齐甘科夫的文章,指出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需要传承和发扬“白银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和宗教哲学

^① 秦亚青、阎学通、张文木、时殷弘、冯绍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畴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第24页。

^③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一项观察》。

^④ 刘军、强晓云:《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与发展趋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思想,克服经验主义研究不足、缺乏中层理论和宏理论的高度抽象等问题^①。袁胜育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究俄罗斯外交和内政的关系,发现俄国国内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发展演变^②。在刘再起看来,俄罗斯学者至今尚未突破在国际关系学研究方面的描述和逻辑—直觉方法占主要地位的局限,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的启蒙是通过齐甘科夫、列别杰娃、科索拉博夫等人的著作实现的^③。袁鹏考察了美国对俄战略依据、目标、框架和变化,讨论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总结出美国对俄罗斯独特的“耐心接触、坚定防范和悉心经营”的特质^④。陈新明分析美俄两国解释国际关系的符号系统,认为美国通过改变俄罗斯的符号系统而对其施加“软”影响的努力难达预期,俄继续使用“反霸”符号解读美国信息^⑤。徐坡岭通过对俄美欧三方经贸关系的分析,旨在说明,以贸易、货币金融和外国直接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经贸关系增进了三方的共同利益,确保了三方关系结构的安全性^⑥。黄登学对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类型学处理,通过退让和抗争类型的分析来探讨俄美关系的未来^⑦。高飞引入国家身份议题,探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其中就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子^⑧。王铁军译介英国著名学者萨科瓦关于美俄“新冷战”的分析,运用新现实主义和“等级制”探讨了美俄“新冷战”的可能性^⑨。钮菊生接连发表两篇书评,认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社会学》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列丛书预示着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觉醒”,是“既向西方学习,又积极思考俄罗斯本国学派发展”的有益尝试^⑩。夏立平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① [俄]巴·阿·齐甘科夫:《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现状与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

② 袁胜育:《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的一项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刘再起:《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④ 袁鹏:《美国对俄战略析论——依据、目标、框架、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

⑤ 陈新明:《俄美关系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项符号学意义的考察》,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6期。

⑥ 徐坡岭:《试论经贸关系对现代国际关系结构的影响——以俄美欧关系为例》,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⑦ 黄登学:《从退让到抗争——试析俄罗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变化》,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⑧ 高飞:《国家身份变迁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⑨ [英]R. 萨科瓦:《是“新冷战”还是“二十年危机”——俄罗斯与国际政治》,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王铁军:《“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

⑩ 钮菊生、王前:《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新视野——评〈国际关系社会学〉》,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钮菊生:《中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交流的有益尝试——〈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丛书评介》,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6期。

对俄罗斯的核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①。

另一股学术浪潮则更注重对问题本身的挖掘，通过问题建立新的视角和理论，更新当前政策和追踪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往往侧重于几个层面：第一，通过对普京思想和俄罗斯领袖对外战略思维的把握开展对俄罗斯内政外交方面的综合研究。许志新通过俄总统普京的言论和官方文献判断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宗旨在于避免麻烦，积极围剿，建立国际控制结构^②。王晓泉研究普京的东北亚政策，强调在普京看来只有加强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影响，才能发挥出俄罗斯的大国的独特作用^③。郑羽研究普京思想的演变，认为其战略思想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新斯拉夫主义的独特路径^④。赵华胜发现普京外交糅杂着多种成分，但其基本属性是回归传统^⑤。第二，通过对俄罗斯传统地缘思想和权力政治的探讨，分析俄罗斯对外关系，表现出构建中层理论的努力。杜正艾谈及地缘特点对俄罗斯外交传统有很大影响，表现在其地跨欧亚、外交弹性和回旋空间大、应对不同行为体表现出复杂性的特征^⑥。徐昕总结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实用主义原则：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扎扎实实地谋求复兴发展多边关系，但不轻易承担义务，追求相对灵活的地位^⑦。左凤荣认为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定会引起国际结构的变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更加稳固^⑧。

第三个层面是对各个板块的探讨，研究俄罗斯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政策，通过丰富在地知识加深对欧亚地区各类问题的理解。例如在2004年之后，中亚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以知网的样本容量作为调查对象，以“中亚”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我们发现在2005年论文数量首次突破1000篇。这只是个粗略的估计。在高加索地区，关注度也在上升。学者们主要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将外高加索地区分为两对三边关系：俄罗斯—小国—次地区——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和议题分析的方法分析权力互动和地区冲突；外来势力（欧美国、土耳其和伊朗）—俄罗斯—小国——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

① 夏立平：《论俄罗斯核政策与核战略——兼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许志新：《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解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王晓泉：《普京政府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特点及影响》，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4期。

④ 郑羽：《普京外交思想的演变：由现实主义到新斯拉夫主义》，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

⑤ 赵华胜：《普京外交八年及其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

⑥ 杜正艾：《地缘特点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影响》，载《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⑦ 徐昕：《论俄罗斯的实用主义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4期。

⑧ 左凤荣：《俄罗斯的强国传统与中俄关系》，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理论)分析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之因。这方面优秀的文献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另外,欧亚地区一体化研究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也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加强之中。

随着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在新的问题领域里运用新理论使用新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界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也推动了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转型。2008年11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政治类期刊工作交流会”,来自全国20多家国际政治类期刊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就加强国际政治类期刊学术规范达成共识,并发表《加强国际政治类期刊学术规范建设倡议书》^①。欧亚国际关系研究学界站在21世纪新的起点,通过学者持续的努力和学术自觉,在反思和互动中成长。这种成长也推动了欧亚地区研究规范化,通过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论证理论化的假设和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欧亚学界普遍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引导下,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很快进入“第二次转型”时代。

四 第二次机遇：走向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

2007年布热津斯基撰写的《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和美国超级大国的危机》问世,他认为2008年美国大选势必成为美国政治一道新的分水岭^②。金融危机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甚至对西方的全球主导权构成危胁。相比之下,俄罗斯在2008年表现不俗。2008年俄格战争是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强权政治的“反动”^③。尽管这次冲突没有总体改变“美攻俄守”的欧亚地区格局,但却极大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声望,进而巩固其国内政权。中国在2008年继续紧抓国际战略机遇期,实现大国和平崛起。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9月,来自美俄等国40多个国际问题专家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中俄美三边关系：观念、结构与政治”国际研讨会^④。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这一历史变迁的时期,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重新定义其国际角色。俄罗斯对外战略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格局和中国崛起的重要变量。2010年,北京召开首届“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将俄

① 刘博：《2009~2013年我国国际政治类期刊与学科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季志业：《俄格冲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9期。

④ 《中俄美三边关系：结构、观念与政治》，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

罗斯、东欧与中亚地区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①。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这一战略举措极大扩展了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促成了欧亚地区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学界对俄罗斯国际定位的提升加速了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随着《俄罗斯研究》改版、《俄罗斯学刊》创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更名，国内学术界研究俄苏国际问题领域的专业期刊发展逐渐成熟，预示着中国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②。

（一）新一代研究力量的崛起与“中俄关系”学术热点的形成

相较于学术期刊发展与繁荣，学界更是呈现出异常活跃的研究氛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从最初的翻译介绍阶段逐步走向通过案例研究、演绎分析等方式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阶段^③。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深度运用，中国学者已经较为熟练运用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对欧亚地区国际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开始构建新的理论和观念体系。新一代力量逐渐走进学术舞台中心，进一步抓住发展机遇崭露头角；中青年力量相互支持、奋发进取，构成了研究当前国际问题的主色调。曾向红通过细致的学术梳理发现美国为重塑中亚及其相邻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减少“颜色革命”造成的战略损失，多方面推进美国中亚战略的转型和调整^④。杨成通过结构现实主义分析中亚地区格局，并运用权力结构模式探讨中亚未来的可能格局^⑤。潘志平通过中亚存在相互交织的“大小博弈”进行地缘政治现状分析，认为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将改变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⑥。庞大鹏通过“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纲领——普京计划，分析其对俄罗斯对外战略特别是中俄关系的影响^⑦。李兴基于

① 吴恩远：《首届“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开幕词》，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自2007年开始，《俄罗斯研究》的刊期由此前的季刊变更为双月刊；黑龙江大学主办的《俄罗斯学刊》于2011年创刊。

③ 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和综合》，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

④ 曾向红：《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环境：2005年以来美国的中亚政策调整》，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6期。

⑤ 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⑥ 潘志平：《中亚地缘政治现状分析（2008~2009）——相互交织的大小“博弈”》，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⑦ 庞大鹏：《论俄罗斯的“普京计划”——兼论对中俄关系的影响》，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1期。

中俄战略构想比较分析视角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认为双方构想的相似性决定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是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①。汪金国讨论了冷战后美国对南高加索战略的演变,强调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俄罗斯利益从边界安全利益到安全边界再到利益安全的层进^②。焦一强讨论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美平衡外交,强调这种外交虽然获得了丰厚的国际资源,但在俄美大国夹缝中求生存为其国家政局稳定带来了巨大灾难^③。杨恕和李捷探讨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认为其包括横向扩展和垂直升级两个维度,不仅容易外溢也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甚至是战争^④。

随着中俄合作的深入开展,俄罗斯对外战略形成机制成为中国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及情境性前后矛盾的重复出现,即立场的不对称变化以及与参与政策形成巨大反差^⑤。中国学者也在尝试破解俄罗斯对外战略影响因子及其形成机制。邢广程在总结以往俄罗斯政治、社会和思想精英的文化趋向中看到了俄罗斯的欧亚选择症,认为中俄关系需要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排斥“中国威胁论”的干扰^⑥。冯绍雷在研究俄罗斯政治转型中得出其对外关系的逻辑,即几乎每一任政治领导人在其执政开始阶段总是以倾向于西方的政治选择作为开端,但是,在其执政之末,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与西方关系的崩坏或疏离^⑦。林精华使用建构主义分析中俄合作必须要再造形象,且中国形象再造需要和俄罗斯定位于欧洲价值观的历史进程相协调^⑧。

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中俄关系从以前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热点上升为国际关系理论界和中国战略界关注的重要话题。2012年阎学通发表《俄罗斯可靠吗?》一文,从联盟政治的视角探讨中俄结盟的必要性,认为俄罗斯对

① 李兴:《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途——基于中俄战略构想比较分析的视角》,载《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1期。

② 汪金国:《论冷战后俄罗斯对南高加索战略的演变》,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

③ 焦一强:《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美平衡外交》,载《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④ 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

⑤ 瑞加娜·海勒:《主观性很重要——重新思考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

⑥ 邢广程:《俄罗斯的欧亚选择与中俄边疆区合作》,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

⑦ 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华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

⑧ 林精华:《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再造及其自身的欧洲定位》,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华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①。尽管放弃不结盟对中国而言存在优势，但这方面的优势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②。相反，俄欧亚研究学术界从各个角度谨慎看待中俄结盟的理论与现实，对两国的未来发展还是持“结伴而不结盟”看法^③。

（二）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在地化”与“地区化”

对欧亚地区关注日益深入的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从主体间层面探讨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打破国家黑箱，看到国家内部势力与国际力量之间的联动。但要打破藩篱，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正如冯玉军指出，鉴于俄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又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俄形势变化的细微末节^④。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很多学者发现，仅从国际关系层面再也无法提供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深层次理解。乌克兰危机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的国内外关系，大国交织的利益博弈以及民族和政治认同的问题不可能仅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去掌握。要打破这一局面，必须要克服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中心论”的局限性，深入挖掘两个方面：地区和地方。从地区来看，一体化研究已较为成熟，欧亚地区的地缘结构和一体化建设必然会对一些重大问题提供答案。从地区来看，深入到欧亚地区各国内部，探讨一些小行为体和中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成为理解当前俄罗斯对外战略变化的重要角度。很快，学术界又兴起了两股学术浪潮：一股是对在地化知识的要求和中层理论的建设；另一股则关注超国家行为体——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带一盟”对接。

在地知识建设层面有许多青年学者在贡献力量，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这一领域堪称典范。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形成了三大

① 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② 李捷：《告别不结盟？——中国学者关于联盟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载《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4期。

③ 姜毅：《不靠谱的中国结盟说》，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5期；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赵华胜：《“中俄结盟”为何缺乏现实可行性——基于两国关系历史和现实的考量》，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0期；傅莹：《中俄关系：是盟友还是伙伴》，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王海运：《“结伴而不结盟”：中俄关系的现实选择》，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5期；谢超：《与俄罗斯结盟吗？——俄罗斯国家利益与中俄结盟概率》，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

④ 冯玉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客体与路径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

研究方向：中亚及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反分裂理论及新疆问题研究、反恐怖主义研究^①。2013~2018年，中亚研究所师生合计发表CSSCI论文150多篇，其中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发表论文18篇。另据统计，2010年以来，中亚所有两篇高质量的论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转载，7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②。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则更强调国际化与在地化相结合。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中心与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设立海外工作室，定期举办系列性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包括“中俄联合研究院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瓦尔代’论坛亚洲分会（中俄分组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并拥有长期的学术交流与互访项目^③。这些平台和项目无疑为学者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学术舞台，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大的方向上研究中国与欧亚地区的互动，分析研究欧亚地区一体化，需要完整有力的学术力量。这一方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堪称得天独厚。俄欧亚所对欧亚地区一体化、中俄关系的发展演进、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互动关系都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2016年，俄欧亚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和《欧亚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首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前沿论坛，邀请青年学者参会讨论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沿和发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欢迎。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起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研究发布年度《中俄关系研究报告》，罗列了中俄在政治、经贸、文化、军事、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共识与不同观点，对中国倡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进行分析研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正如青年学者杨成所指出的，“新俄苏研究”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化的俄苏研究，也不是套用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俄苏研究，其在研究对象的时空结构、知识体系、语言工具、研究方法、研究志趣、思维方式、学术追求、学术组织、学术范围上都应与过去有所不同^④。在某些层面上，这种可喜的变化已经展现出来。冯绍雷教授组织出版的“国外俄苏研究丛书”似乎就是这种变化

①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简介》，<http://icas.lzu.edu.cn/1/3/>

② 《兰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五年成果掠影》，http://www.sohu.com/a/243415343_806783

③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简介》，<https://rus.ecnu.edu.cn/iv5445.htm>

④ 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畴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

的展现,既关注俄罗斯本身的演进,又关注西方关于俄苏问题研究的广泛争论^①。一些在国际关系中层理论上的建构也反映了这些尝试的有效成果。杨成和肖斌分别从两个不同的维度研究中亚地区,前者看到中亚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相互建构中存在的张力和问题,后者则引入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自变量,讨论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②。顾炜和赵炜则运用现实主义理论探究行为体在欧亚地区的地区战略,前者探讨的是中国通过何种方式介入后苏联空间,后者则分析俄罗斯边缘身份如何影响到其国际地位和地区地位的稳固^③。冯玉军和柳丰华则探讨了乌克兰危机的生成机制^④。姜毅、文龙杰和梁强探讨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对外行为,前者强调国内外互动视角,后者探讨其对于普京危机外交的地位和意义^⑤。此外,还可以在一些国别问题研究上看到一些青年学者的努力,例如韩克敌从美国角度反观乌克兰危机,张昕对俄式“国家资本主义”持续关注和研究,封帅对“克里米亚”和“北极航道”的研究,马强对政治人类学的关注和探讨,孙超对南高加索问题的关注等^⑥。他们极大地丰富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议程,推动了当前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

^① 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封帅:《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韩冬涛:《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肖斌:《地区极性、现状偏好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2期。

^③ 顾炜:《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赵炜:《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

^④ 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柳丰华:《乌克兰危机:内因、大国博弈因素与前景》,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

^⑤ 姜毅、文龙杰:《被撕裂的乌克兰:一种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5期;梁强:《从“近邻政策”到“向东看”:乌克兰危机与普京的战略决策》,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

^⑥ 参见韩克敌:《美国学界政界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与思考》,载《美国研究》2014年第4期;张昕:《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双重逻辑》,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封帅:《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封帅:《概念红利、内生型障碍与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开发的战略困境》,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2期;封帅:《利基航线、俱乐部物品与北方海航道开发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一个中方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马强:《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孙超:《国际干预、强力与国家与分离冲突的升级——基于欧亚地区的四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孙超:《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载《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

结 论

中国俄苏研究有没有成熟起来？答案是肯定的。从不同时期的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观察来看，当前中国的学术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即从对地区和国别问题研究的消化吸收转型为自主构建理论，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分析范式来理解和分析国际问题的阶段。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有其优势和独特性，尤其是在俄苏问题领域。中国学者更能够克服意识形态和“恐俄症”的束缚，站在全局的角度以相对中立的客观立场思考问题。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苏联学出现整体性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难以面对作为伙伴或朋友的俄罗斯。长期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已让美国战略学界部分丧失了学术问题挖掘的敏感性和客观性。相对于西方，受益于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学术界能够更加灵活地使用新的理论工具观察、分析和理解身边的研究对象——欧亚地区15个国家。

尽管西方理论有其缺陷，但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重建初期，认真学习和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从中国俄苏研究学术演进历史可以看到，学习西方理论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非常有助益的。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以及学界研究能力在不断增长，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关怀也在不断强化。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一些学者基于西方制度和权力衰落的立场，呼吁不要再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要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但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40年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依然很难离开西方理论而独自前行，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相较于国外同行而言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一时还难以形成国际影响力。即使当今我们评价很高的俄苏国际问题的作品也难以拿到国际上与海外专家一争高下。

这种评价并不是对40年来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到我们的差距与现实。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数代学人的努力，更包括基础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发展和积累。地区与国别问题研究在当前搭上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这也是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新机遇。我们需要通过原创性的“知识生产”改变当前中国国别和地区研究的现状，更需要学人们“忍不住的关怀”，意识到真问题的研究和学术理论作品的撰写对学术进步的巨大意义，同时也要防止区域与国别研究过理论化带来的知识失误。过分追求理论化研究，将会丧失对俄苏国际问题的敏感

度，造成研究主体的迷失，这种迷失的细微变化长久以往就会造成事实与理论的巨大差距，形成“理论不能解释”的情况^①。如果没有深入了解当地陌生社区的生活、弄明白其复杂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很难对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处有深刻理解，这也是芬诺所说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拥有“浸润而后突破（soaking and poking）”的过程^②。长期使用西方理论对俄苏国际问题进行的解释可能也会造成难以意料的“不安全感”和范式危机。

当前的中国学术研究超越了中西之辩，而是个人爱好与学术研究惯性之间的分歧。正如库恩预见到的，我们正处在显著的“专业不安全感时期”——这种不安全感是在常规科学解不开它本应解开的谜的这种持续失败中产生的^③。俄罗斯对外政策复杂性、欧亚地区频繁出现的地区和族群冲突以及当前“长普京时代”政权稳定性所形成的俄罗斯特色大国外交，加之中亚和高加索内在的宗教族群冲突都成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难解的问题反而给中国国别和地区研究以机会，使之能够建立起中国本土特色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

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已经跟上国际学术发展的浪潮，但中国学术界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领袖和研究重镇。这就要求学术界出现一批既懂理论又对在地知识非常了解的专家学者，也需要青年人围绕真问题从事踏踏实实的研究。可以相信，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摆脱我们当前在国际学术界的尴尬地位，成为地区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集散地。在中国正处于崛起腾飞的历史关头，俄苏国际问题研究也将拥有新的发展机遇，而所提供的“知识产品”也将更为有力地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发展。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张云：《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对话与融合——兼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力支持建构》，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

^② 陈岳、莫胜凯：《以深化地区国别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载《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

^③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